

傳播論壇

從比較視角看中華傳播的研究與創新

陳韜文

摘要

本文首先以理論創新為出發點，說明何謂比較傳播研究視角及其在知識論上優勝之處。此外，本文也探討當今傳播學轉向比較研究的趨勢，並以中華傳播中實際的研究成果說明比較研究的可觀性及可行性。傳播學的理论概念經數十年而少變，可算貧乏。理論概念的創新就是改變這現象最直接的方法。比較是理論概念創新的必要過程，是研究方法中的最基本的步驟，可以用在概念化、提問、假設、理論、研究重要性發掘等各個研究環節。這裡所說的比較傳播視角，並非單指兩個或以上社會系統的正規比較研究，也包括單一系統研究中的不成文比較思維。無論是為了理論概念的創新，或是為了檢測理論概念的適用性，又或為了找出社會脈絡或社會系統因素對傳播的影響，比較研究都是富有成效的選擇。

關鍵詞：理論概念創新、比較傳播、比較研究方法、中華傳播、傳播學本土化

陳韜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傳播與社會學刊》創刊主編。研究興趣：政治傳播、新聞學研究、國際傳播。電郵：jchan003@gmail.com
論文投稿日期：2021年1月3日。論文接受日期：2021年3月1日。

For a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Reflections on the Loc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of Media 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ies

Joseph M. CH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seeks to explicate the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While its epistemological strengths are highlighted, the article also examines what appears to be a “comparative turn”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It illustrates the desir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 studies by drawing on various research projects done in Chinese societies. Communication studies have been criticized for its relative lack of concepts and theories. The best answer to this criticism is to innovate in conceptualization and theorization by adopting the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Comparison, a key component of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s applicable to every aspect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including conceptualization, research question formulation, hypothesizing, theorization, and the articulation of research significance. The perspective assumes that all communication phenomena are results of social contingencies. Comparisons can be formal and explicit. They can also be informal and implicit, meaning that the researchers can think comparatively, engaging in thought experiments, asking how the phenomenon in question may

Joseph M. CHAN (Emeritus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unding Editor-in-Chief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studi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or a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vary as the social context changes over time or space.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quires the contingencies giving rise to a communication phenomenon to be problematized and spelt out. It enables u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ralities and specifications of media theories and to have better knowledge of how variables at the systemic level can impinge upon communication behavior at other levels.

Keywords: conceptual innovati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loc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Chan, J. (2021). For a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Reflections on the loc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of media 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ie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56, 225–25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概念理論的貧乏

傳播學發展已有大半個世紀，研究人員增長迅速，但滿意傳播學理論發展者卻不多見。據Walter、Cody和Ball-Rokeach (2018)就世界傳播學旗艦期刊《傳播學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0年來所發表文章的分析，作者們所探究的理論概念可謂歷數十年而少變，當今最流行的十大理論概念還是大家認識多年的framing、cultivation、agenda setting、social learning theory、third-person effects、uses and gratifications等。這似乎印證了李金銓教授(2012)前些年的感嘆：從他入行到快將退休，大家所熱衷討論的仍然是同樣的一些理論概念，期間產生新的洞見並不多見。上述理論概念當然曾經一度是創新、有其值得探討的地方，但我這裡所關注的不在於個別理論概念的內在價值，而是傳播學理論概念總體發展不足的問題。西方傳播學的理論概念發展尚嫌不足，後起的中華傳播研究更瞠乎其後，彼此也未能平等對話。中華傳播研究產量30年來有頗大的增長，但是論新的理論概念，尤其是具有跨文化影響力的理論概念，更見貧乏。

目前世界傳播研究由西方主導，不少學者先後呼籲傳播理論要「非西方化」、「國際化」和「本土化」（如Curran & Park, 2000; Thussu, 2000; Lee, 2015）。無論具體用詞及指向為何，他們都是有感於源自西方社會的傳播理論有歐美中心主義的傾向，把歐美的脈絡視為當然而不自知，對它們在非西方社會的適用性存疑。所謂本土化，首先是指建基於本土社會的原創理論概念（陳韜文，2002）。這種原創理論概念可能是源自在地社會的獨特性，也可能是有關社會現象並非獨特，也同樣存在於其他地方，只不過是為本地研究者首先發現而已。本土化其次是指把外來理論應用於本土社會時可能因為社會的特殊性而對有關理論作出的補充、修訂或否定。不管是哪一種本土化，都是理論概念的創新。

要改變理論概念貧乏的現象或加強理論概念本土化的關鍵均在於理論概念的創新。只有創新，傳播研究才可以跟上世界的發展；也只有創新，中華傳播研究才更能促進傳播理論的發展，促使東西方更平等的對話。如何才能讓中華傳播研究有所創新？這個問題的解答牽涉

到多種因素的互動作用，包括研究文化的培養、教研體制和研究資源的配合等。簡而言之，創新需要一個側重創新的研究文化。在此文化的熏陶下，研究者所看重的不在於背誦傳承多少，而是創造發明了多少。教研體制是否支持鼓勵創新也是問題所在。從教研機構的獎懲規定，以至發表渠道的取向，對創新都有激發或壓抑的作用。是否有足夠資源當然也是創新的重要條件。不過，有關資源不限於物質金錢，也包括人才能否發揮群聚效應。由於以上問題牽涉面比較廣，不是我在這裡所能全面討論的。我主要是想回到研究的內在邏輯本身，探討一下比較取向如何可以促進傳播理論概念的創新，並以多個實際的研究計劃加以說明，藉此引起華人學者的比較自覺意識，加深大家對比較思維及比較傳播研究的興趣。

在深入探討以上問題之前，我應該說明，我這裡所說的「比較取向」，並非單指兩個或以上社會系統的正規比較研究，也包括單一系統研究中的不成文比較思維 (implicit comparison)，包括同一社會系統的歷時比較、跨地比較、跨事件比較。換言之，比較思維可以應用於不同層次，從單一社會系統研究的概念化、提問、假設及理論各個環節，到兩個或以上社會的正規比較研究。後面我將分別論及。

理論創新的自覺追尋與華人社會

傳播學的基本使命，就是創造符合現實的理論概念，增加我們對社會現實的了解。創新可說是學科發展的生命。沒有創新，不是社會停頓就是理論已然僵化。理論概念的創新可以源自對現有理論的綜合、分析和推論，更可以是源自我們對新生現象的觀察和理論建構。由於人類行為及社會形態不斷變動，是以理論概念也要不斷創新 (陳韜文，見羅文輝，2012)。理論概念的建構多是現實變動的反映，有一定的滯後性，故也一定要與時俱進。不少現存傳播理論是出自70、80年代的西方民主國家，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科技條件跟今天已大有不同。世界格局已由冷戰對立轉到東歐解體、全球化、恐怖主義突襲、中國崛起，以至到了今天西方與中國又再走向敵視對立。不少國家的經濟都因全球化等因素而重構，財富重新分配。多國社會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的政治走向兩極分化，社會難言共識。傳播環境翻天覆地，由大眾傳媒主導的穩定世界轉為多元分化的數碼時代。周遭環境變化如此巨大，如果今天還完全照搬當年的理論概念，難免有脫離現實的危險，是以不少西方傳播學者也感受到挑戰，自覺尋求新的出路(Bennett & Pfetsch, 2018; Entman & Usher, 2018; Sparks, 2018; Kraidy, 2018)。

中華傳播研究者處於高速變化的社會，其理論危機感應不會小於西方同行。華人社會中，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三地在過去30、40年都經歷過重大而急促的社會變遷。簡言之，中國大陸經歷文革，走出激進主義，實行改革開放，引入市場經濟、實行官僚體制改革、加入世界經濟大循環，一躍而成為東方強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國際影響力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的傳播基礎建設更見高速發展，已建成高度集權但技術先進的傳播網絡。香港經過漫長的政治過渡期，回歸後實踐「一國兩制」也已有二十多年，一直保持世界金融、航運、商貿中心的地位，但香港人對民主自由自治等權益備受侵蝕感到十分不滿，爭取權益的大型社會運動此起彼伏。香港曾是亞洲傳播中心，名重一時，但隨著中共對港政策的收縮，新聞及言論自由現已大幅倒退，香港的傳媒以至社會整體日漸失去昔日的活力。台灣最大的變動是由威權制度轉化為民主政治，出現兩黨輪替執政，民間社會生機旺盛，新聞自由更史無前例地蓬勃興旺，網絡傳播盛行。不過，由於海峽兩岸關係緊張，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國際關係萎縮，備受統獨問題困擾。無論是大陸、香港或台灣，社會變遷的幅度和速度，不可謂不大。傳媒處身其中自是深受影響。華人社會的變動相對於歐美諸國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理論創新的可能性以至對理論概念的創新要求自是不遑多讓。

中華傳播研究除了滯後於現實的問題外，很多時候視歐美研究潮流為研究的最前沿，亦步亦趨地跟隨。長期不自覺地樂此不疲，我們的創新意識會受到無形的抑制。現存的傳播理論概念絕大多數源自西方社會，這是歷史的自然現象，無須介懷。不過，久而久之，有些人以為西方先進社會才是理論概念創新理所當然的溫床，才是知識前沿之所在，反而對華人社會所蘊藏的創新潛力和前沿性視而不見。

這裡試舉兩個例子加以說明。

全球傳播研究的一個主題是文化帝國主義問題，其中一個焦點是探討文化全球化與本土化的關係。關於這一點社會學家Robertson (1995) 在90年代借用日本人的概念而整合出流行一時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 的概念，指現代文化是文化混雜的結果，個中同時涵蓋全球化與本土化。回頭看，我們可以問：這個理論概念可否出自華人社會研究者？我覺得完全有這個可能性，因為華人社會很早就出現東西混雜的文化現象。譬如，美國《花花公子》(Playboy) 等雜誌在80年代就有內容中外混合的香港中文版本，誠然是「全球本土化」的一個現代寫照。事實上，文化混雜的現象在其他華人社會以至別的后發國家早已有不少，問題是當地研究者有否率先加以理論化概念化而已。民國時期的「摩登上海」所蘊藏的全球本土化現象應該數不勝數。在政治方面，當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時，經過一個適應與本土結合的過程，最後演變出中共所推崇的毛澤東思想，以鄉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取代城市工人階級起義的主張，這也何嘗不是一個政治思潮全球本土化的重要案例？可惜的只是未曾有學者及時概括出一早已經出現在中國社會中的全球本土化現象。

社會運動研究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組織及參與形態，而傳播學者特別關注的是個中傳播的作用。Castells (2012) 對於新興的社運以「網絡社會運動」(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 加以概括，而Bennett及 Segerberg (2013) 也以「聯結行動」(connective action) 跟傳統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 加以區分。香港回歸以來大型社會運動不斷發生。2003年轟動一時的五十萬人反國安法大遊行，以至之後所發生的一連串要求民主自由的遊行示威與及2014年轟動一時的雨傘運動，它們所呈現的是一種自發組織的「人民力量」(people power) 表達形態，也或可說是香港版本的「網絡社會運動」或「聯結行動」(Lee & Chan, 2011)，又或者是「集體行動」與「聯結行動」的混種 (Lee & Chan, 2018)。這些發現充分說明香港社運的「先導性」是無容置疑的，問題只在於學者能否及時進行研究和概括出恰當的理論。到了今天香港的反修例運動，它所呈現的是像流水、沒有大台領導的橫向網絡組織形態 (Lee, Yuen, Tang, & Cheng, 2019)，隱然有帶動世界社運潮流的跡象，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無疑為研究者提供了另一個理論概念創新的機會。相關研究尚在進行中，我們或可拭目以待。

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到，類似的社會現象差不多同時出現在西方與華人社會，為各自的研究者提供同樣的理論創新起點。我們切勿假定歷史的線性發展，以為西方社會發展在前，所蘊藏的理論概念一定更具先導性。事實上，隨著全球化、數碼化、民主化等等因素的普及，越來越多社會變動會同時出現在世界各地，大家都要面對相似的問題，故此不可低估華人社會研究的先導意義。此外，在全球本土化的作用下，不少社會現實本身已經是一種全球化的結果(globalized reality)，在多方面已是本土全球的混合體(hybridity)，蘊藏著兩個或以上的文化痕跡，自然也帶有因混合而來的先導意義。

華人社會值得研究的地方不完全因為它們的前沿性，有時更在於它們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可能是因為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等因素所造成，也可能是特定時空的產物，應該也是社會科學理論創新的土壤。說到獨特性，中國大陸無疑是這方面的佼佼者。事實上，由於有不少社會關係、現象、觀察似乎並不適用於中國，故有「中國例外論」(Chinese exceptionalism)之說。雖然此說有其爭議的地方，但也顯示出中國確有不少獨特的地方，不容忽視。社會科學不少理論和概念都是源自西方過去的歷史、或是西方相對落後的地區，及發展中國家。由此可見未曾被理論化、概念化的社會現象，不管是來自西方東方，都是理論概念創新的基本材料。我們更不要喪失對華人社會的先導性和獨特性的自信，更不應該妄自菲薄。

比較是理論概念創新的起點

比較可以說是研究方法中的一個最基本的步驟，也是創新的起點，貫穿從概念生成到理論建構整個過程。創新首先講求的是研究者的求新意願，因為求新能啟動我們的觀察力、聯想力和想像力，使我們把新的現象和相關的理論概念連接在一起考量比較，從而有所發明創造。這個比較的過程，固然可以發生在正規的比較研究，同時也可

出現在單一社會系統的研究裡 (Chan & Lee, 2017)。無論是正規的或是單一系統的非正式的比較，可以是社會系統的前後對比，或是橫向比較。透過這些比較，社會模式的轉變及其存在的條件會變得更明晰，而理論概念的創新也變得更可能。比較可以激發我們的理論思維，從而增加研究過程每一環節的理論性和創新性。比較可以使我們提出較有理論意義的問題，因為比較性思考讓我們對傳播現象的共性和特性產生更敏銳和深刻的認識，從而發掘出有關研究的新意及重要性。就算是個別社會的研究，如果我們運用比較思考，自覺把問題放到不同的社會背景中去考察，甚至進行思想實驗 (thought experiment) (Smelzer, 1976) 加以對比，這樣我們對有關概念、提問、假設、理論及其存在條件的了解會變得更透徹，從而更有可能創新，看到新的洞見。

比較是理論概念創新的必要過程，沒有比較就沒有理論概念的創新。就以基本概念的生成來說，也離不開比較這核心活動。即便是「媒介」這樣最常用的概念，我們也是從不同的傳播活動中比較歸納出來，繼而以媒介一詞泛指傳播中的中介。一旦中介的概念成為「媒介」，它以後就成為我們分析報章、電視、電台、互聯網或是其他未來傳播方式的基本概念。再以近年甚為流行的「迴聲室效應」 (echo chamber effect) 為例，我相信研究者也是比對不同個人選擇訊息的結果，從中看到不少人只熱衷選取與己相符的訊息，以至最後演變成一個像「迴聲室」那樣相對封閉的訊息系統。人們在社交媒體盛行時代，對迴聲室效應特別關注，大概也是歷時比較的結果，因為在互聯網時代，迴聲室效應更是明顯。

比較思考可以應用在單一社會系統研究的多個環節，除了對概念化有所助益外，對提問、假設、理論、重要性發掘各個環節的創新都有裨益。我記得我在80年代中唸博士時，香港剛進入回歸的過渡期，傳媒受到一定的衝擊，遂以香港傳媒與政治過渡的互動作為博士論文的主題 (陳韜文，2002)。如果單把焦點放在香港的政治動態上，論文自是停在新聞分析的層次，說不上什麼理論貢獻。在理論化的過程中，我想起像辛亥革命、中共革命、蘇俄革命等權力更迭都有導致傳媒重構的情況，於是進行了簡單比較思考，繼而把論文的提問定為：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當社會的權力結構更替時，新聞範式如何作出改變？香港回歸是一特殊案例，其特殊的地方在於其權力結構的重組是漸變的，不像其他革命劇變。另一個特殊的地方是香港開放自由的系統將會在「一國兩制」安排下受到一個集權國家的制約。以上新的提問使研究的理論意義有所擴充，其重要性也較容易被國際學者理解。這個研究的核心概念是新聞範式 (journalistic paradigm)，它的產生也是比較的結果 (Chan & Lee, 1991)。一種比較是香港傳媒內有左 (親共)、中 (非政黨控制)、右 (親國民黨) 之分，另一種是世界上至少也有專業主義 (professionalism) 和鼓吹新聞 (advocacy journalism) 之分。為了包容不同新聞觀存在的事實，所以我們以較高層次的概念——新聞範式——來加以概括，意指新聞工作者的世界觀、新聞價值、行為規範和心中新聞典範的總和。

另一個受惠於比較思考的研究是我與茅知非 (Chan & Mao, 2017) 對中國大陸採用資訊透明度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的研究。中國大陸對處理非典肺炎 (SARS) 及細顆粒物 2.5 (PM2.5) 的資訊政策起首是封閉的，有別於香港及西方諸國，其後才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轉變而趨向透明，逐步與世界看齊。我們因而有此提問：一個國家對跨境危機的資訊反應是如何形成的？經過比較思考，我們把中國的政策反應看作是資訊透明度全球化與本土結合的問題，是世界傳播同步化 (communication synchronization) 的現象，也是對全球化現實的一項研究。這個研究另一比較角度是探討非典與微塵不同性質的議題，如何影響國家的資訊政策。根據中國的案例，我們提出民族國家對跨國危機的反應模式，以此分析國家特性、國家安全及合法性考慮、跨國媒體、國內媒體、全球機構及專家社群、在地機構及專家社群等因素，如何互動才導致傳播同步化的現象。由於非典比細顆粒物 2.5 所構成的危機急逼許多，外部力量——包括跨境媒體、機構及國家——對中國所構成的壓力也明顯較大。這項研究是單一社會系統的研究，但是它的提問與理論化則是借助內外比較的結果。

我上面說過，比較有時也何以促成洞見的產生。請讓我用另一個例子說明這一點。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新聞學者中的一個爭議是新聞專業主義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是否存在？對中國是利是

弊？對比西方的專業主義，陸曄和潘忠黨(2002)發現中國的專業主義處於萌芽、碎片化的狀態。至於利弊問題，學界則眾說紛紜。從西方批判學派的角度看來，專業主義只是權力的附庸，應該受到批評解構。另一說法則從比較的角度出發，認為專業主義有附和權力的傾向，但是在中國的專制體制下則有一定的解放性，有其相對進步的意義。後面的說法，無論我們贊成與否，不能不說是一種洞見，而這種洞見是從比較出發，把現象放回原來的社會脈絡而考察得出的。

一個研究的重要性很多時候是透過研究的創新貢獻來加以說明的，要找出創新之處，新舊比較、跨地域比較或是歷時比較應是不可缺少的思考。沒有這些比較，創新的意義並不容易說清楚。基於同樣道理，不少國際學報、出版社的編輯或評審者對單一社會系統的研究，都有要求作者就其發現，對比其他地方的案例，從而找出發現的獨特性和普遍性。這種比較是以已發表的研究或是作者對其他社會的認識而作出的比較辯證，從而發掘出當中的新意。

比較思維當然也適用於正規的比較研究。比較研究在知識論及方法論上有其優勝之處，對創新也有促進作用。傳播學的理论概念源自社會脈絡，是特定時空的產物(Chan & Lee, 2017)。無論是新理論的建構或是既有理論的檢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同時找出理論概念成立的社會條件。沒有比較，研究者較易傾向把理論概念存在的條件視為當然。比較可以讓我們確定有關理論概念的普遍性及特殊性，從而知悉它們的條件性。比較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一旦條件改變，所謂規律也會改變。我們對理論概念成立的條件了解越多，創新的可能性便越高。由此觀之，比較研究不一定在追求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規律，而在探求出脈絡因素與傳播現象的因應關係，以及脈絡因素如何形塑不同變數之間的關係。理論是我們對社會變數之間關係的概括，透過比較研究可以產生新的理論，也可以對既有理論進行檢測，從而探知它們的真偽或適用性。幾位比較傳播研究的先行者就曾說過，比較研究可以為舊概念帶來新定義，建構跨越時空的新概念，帶來新的研究提問，甚至開闢新的研究路徑和焦點(Blumler, McLeod, & Rosengren, 1992)。比較研究牽涉到兩個以上的社會系統、文化系統、或歷史時期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的比較，它使研究能超越個人層次的分析，引入系統層次的變數作為對比分析之用，從而增加我們對傳媒系統組織的認識，這方面的功能不是單一社會系統研究所能達致的。

因為比較研究有它的優勝之處，不同時代皆有出聲呼喚大家多做比較研究的學者(例如：Edelstein, 1982; Blumler, McLeod, & Rosengren, 1992; Esser & Hanitzsch, 2012)。在《傳播學刊》2018年出版的傳播學回顧專刊(Qiu & Fuchs, 2018)裡，也有多位學者透過縱向和橫向的比較思考，不約而同認為一些經典的理論概念也有更新的必要。在Bennett及Pfetsch(2018)心目中，西方的民主制度、公共空間及媒介的傳統關係已然變質，一些視為當然的理論概念如gatekeeping、framing、indexing、agenda-setting等現在都要加上一個網絡化或新的闡釋。Entman及Usher(2018)也不約而同認為在上述新的環境下，他們過往關於框架分佈的理論也流於簡單，必須把platform、algorithms、digital analytics、ideological media、rogue actors等因素加進去才能回應當今新的現實。沒有前後或是橫向的對比，我相信上述學者不容易作出如此深刻的觀察。

從知識論的角度看，實證取向是比較傳播研究的出發點。這當然首先是因為實證的觀點能夠為研究者提供探索現實最可行及最有效的取徑。其次是因為實證邏輯是最能溝通研究合作者的語言。這裡所指的實證觀點，不是指所有研究一定要量化，否定質化研究的絕對實證主義，更多是指論述必須講事實證據，分析要符合實證邏輯。明乎此，以歷史方法、田野觀察法或其他質化方法進行的比較研究都是可取的。新世紀以來最有影響力的一項比較研究就是由Hallin和Mancini(2004)合著的《媒介系統比較》，而歷史方法就是他們所用的主要方法。由此可見，比較研究的好壞不在乎方法是定量或是定質，而在於問題的意義和答案的說服力。

比較研究的邏輯並不太難掌握，因為它跟實證邏輯是相通的。用量化的語言來說，它所強調的是透過控制變數來確定其他變數與變數之間的關係(Smelzer, 1976; Ragin, 1987; Wirth & Kolb, 2004)。透過比較研究，我們一方面探討變項間的關係是否同時存在於不同社會，也分析何以同一關係在不同社會會有強弱之分。由於比較的系統可以多於一個，研究的分析單位可以是地域或國家，所以社會系統層次的變

數也可以納入比較當中，從而探究不同層次的因素如何對研究的對象產生作用。

這裡不是詳細討論比較方法的地方，只能簡介一下。根據Ragin (1987)的劃分，比較研究的方法取向主要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從比較的角度來探究單一的社會系統，是一個系統性的比較描繪(systematic comparative illustration)；二是以小樣本為主的個案取向研究(case-oriented comparative methods)和以大樣本為主的變數取向研究(variable-oriented approach)。較多為學者採用的是個案取向研究和變數取向研究，或者是兩者的混合使用。

個案取向的方法，所根據的邏輯基本上就是J. S. Mill (1967)所說的相同法(methods of agreement)和差異法(method of difference)，根據個案之中的異同比較事物的關係。個案取向較為適合複雜及詳細的比較研究。變數取向的比較研究很多時候是大樣本的，可以把樣本國家的特性化成系統變數，讓研究者可以用統計方法來檢驗有關假設或探討有關提問。以上兩種方法各有利弊，同時也出於實際資源的考慮，很多學者採取的是一種混合策略，即是從個案取向出發，以其異同組成取樣的根據，在個案中所收集的則是大量的變數資料，從而對相關現象作出比較。不管是那種比較研究，當中的邏輯無非是透過控制變數來確定變數與變數之間的關係。要解釋比較研究中發現的差異，如果是量化研究，很有可能是透過統計控制分析來進行或是結合脈絡化和邏輯思辨來完成。

由於比較研究會牽涉到兩個以上的社會系統、文化、或歷史時期的對比，其中一個核心問題是彼此之間的對等性(equivalence)和可比性(comparability)的問題(Landman, 2000; Smelzer, 1976)。對等性問題分為多個層次，包括社會系統、概念、量度方法、取樣等。如果不對等，比較就無法入手，因為所看到的差異，可能不是真實的差異，而是不對等所造成的。所以，比較邏輯所要求的是研究對象不同層次的對等性。有了這個基礎，事物的異同才變得真正可比。

雖然對等性是比較研究的一個恆常挑戰，但如果研究團隊對研究對象及比較方法有足夠的認識的話，問題不難克服。現就概念和樣本的對等性舉例說明，其他可作如是觀。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概念有時受到地域文化的限制，雖然表面是同樣的概念，但是兩者的意涵並非一致，如果不分彼此的應用會導致錯誤的解讀。例如，新聞研究中新聞自主性 (news autonomy) 的概念，港台兩地或有不同的譯名，但觀念接近，是指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自主的程度，是新聞工作者所珍惜的空間。不過，此一概念在中國大陸尚未定型，有些人會想到這是新聞工作者偏離黨國宣傳路線的「獨立性」，不見容於新聞界。如果在三地問卷中不分彼此的以「新聞自主性」收集資料，因為個中的歧義而造成結論偏差的危險自是不可忽視 (羅文輝、陳韜文等，2004)。其中一項解決的方法是把自主性的定義操作化，然後列出各項相關指標，要求受訪新聞人員逐項回應，從而增加資料的可比性。

抽樣也有是否對等的問題。比較研究的結果會受抽樣方法的影響，因此應依據研究目的設計對等的抽樣方式。回到中港台三地新聞人員比較研究的例子 (羅文輝、陳韜文等，2004)，由於三地的社會結構、幅員和媒介結構差異甚大，抽樣方法需要因地而異。在媒介結構簡單的香港，我們使用的是系統抽樣。由於大陸的複雜性，我們採取多階集群抽樣，先以經濟發展程度和地域所組成的抽樣架構抽取省份和直轄市，再從中抽取城市，繼而抽取被選中城市的媒介，最後才在各媒介新聞人員中抽取系統樣本。台灣的抽樣架構的複雜性介於香港與大陸之間，也要經過多階集群抽樣抽出具有代表性的樣本，只不過抽樣的層階並沒有大陸那樣複雜。三地採取不同的抽樣方法，目的就在增加樣本的代表性和可比性。

可比性是否成立是進行比較研究的前提，進一步要探究的是社會關係的比較。社會科學基本上探討的就是社會關係，而社會關係也可看作是變項間的關係。變項間的關係是否存在？其關係是強還是弱？這是一般研究需要回答的問題，也是比較研究必須回應的問題。透過比較研究，我們一方面探討變項間的關係是否同時存在於不同社會，也分析為何同一關係在不同社會卻有強弱之分。在比較研究中解析差異則較為困難，因為社會系統之間的差異很多，如何歸因往往需依賴研究者的「功力」。研究者的功力取決於他們對研究和統計分析的了解程度，也受制於他們對社會和主題認識的深淺。如何以研究和統計方

法來驗證社會關係的知識，可以透過學習和實踐來掌握。但研究者必須深刻了解有關社會和研究主題，才能把統計發現置於社會脈絡 (contextualization)，從而給予合理的闡析。

以上分析，旨在說明比較是理論概念創新的一個核心過程，有比較才能創新。但是反過來說，有比較也不一定有創新，比較不是創新的萬靈聖藥，還要有求新的自覺和其他條件的配合。比較也可以促進單一社會系統研究的創新，包括概念化、提問、假設、詮釋、評價、產生洞見等各個環節。比較研究在方法上有它優勝的地方，是探索理論概念的條件性和系統變數作用的不二之選。同樣，如果研究者的創新意識不強，甘於做重複性的研究，那麼比較研究也難以在創新方面有重要的貢獻。

比較研究的可行性及趨勢

正式的比較傳播研究在90年代之前甚為罕見，進入新世紀以來則發展迅速，雖然基數並不大，但是每年所發表的論文則以倍數增長 (So, 2017)。隨著世界學者交往日趨頻繁，世界學術文化趨近，互聯網四通八達，學者之間的弱關係 (weak ties) 變得十分普遍，比較傳播自是日趨重要，大有帶動世界研究潮流之勢 (Chan, 2017)。就以華人社會而言，上述促進比較傳播研究的條件是顯著存在的。中港台三地、新加坡以至海外華裔研究人員在過去20年來透過會議、交流、教育或者合作，彼此已形成強弱不一的網絡關係，而學者的研究範式也頗為接近，要從中找到對口的研究合作者並不太難。現代華人社會的網絡發達，學者之間無論是以文字交流的，或是以影像面談的，都已變得非常方便，可謂天涯若比鄰。經過新冠狀病毒大流行的洗禮，大家透過網絡來座談、上課和交流已習以為常，真正生活在被網絡壓縮了的時空，這樣無疑大大減少了研究合作者跨地域商議的成本。在研究經費方面，華人社會的處境也相當不錯，往往要比歐美國家充裕。中華傳播研究者的視野和經歷都比較開闊，對其他華人地區以至別的國家多少都有所認識，這也為比較思考和比較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相對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而言，現在較為欠缺的是比較研究的意識和追求。不過，隨著上述有利因素的發展，再加上研究者的投入，比較思考及比較研究的興起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有些學者對比較傳播研究有一種難以高攀的想像，以為資源負擔重，或者以為一定要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者才能結隊前行。事實上，比較研究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困難(Chan, 2017)。我在這裡想舉幾個例子說明比較研究並非遙不可及，而是一般研究者力所能及的。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有好幾年任教一門叫「全球與比較傳播」的博士班必修課，每次皆要求學生交一篇原創的比較研究學期論文。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同學在學期結束時交出一份香港與美國大學生的比較研究報告，專門探討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如何影響臉書(Facebook)使用和政治參與行為之間的關係。他徵得在國際傳播協會年會僅有一面之緣的美國博士生的合作，分別在馬里蘭大學和香港的大學進行抽樣問卷調查。事後，他們把文章修訂發表，除了獲得AEJMC頒發的一個最佳論文獎外，最後還登載在著名的國際學刊上(Chan & Guo, 2013)。如果一位沒有什麼人脈、資源的博士生，在相當緊迫的時間內尚且能完成一項優秀的比較研究，我相信一般學者如願意的話，他們也能做到。這個案例表明，比較研究並沒有像一些人想像中要求很強的人脈和豐富的資源，最重要的反而是研究者有否比較研究的意識和對提問是否有深刻的認識。

比較研究可以應用在學期論文，也可以應用在國際超大型的研究上。一個較為人知的是以色列傳播學教授Akiba Cohen(2013)所領導的17個國家地區的國際電視新聞比較研究。他們主要是透過內容分析來比較世界各地的公營電視與私營電視如何報導國際新聞。另一個是德國新聞學教授Thomas Hanitzsch所領導的67國的新聞世界研究(Worlds of Journalism)，目的在比較世界各地新聞工作者的新聞文化(Hanitzsch, Hanusch, Ramaprasad, & Beer, 2019)。在此之前，他也領導過一個21國的記者調查(如Hanitzsch & Berganza, 2012)。由於這類大型比較研究計劃龐雜，需要很強的協調力。它們主要是利用互聯網、專門工作會議等方式來進行；研究經費則主要由團隊成員各自負責。雖然研究者對量化研究的理解並非完全一致，但彼此的基本認知是接近的，故也

可以協作成事。由於他們能建立比較研究的網絡，是以最終能以可控的成本，完成傳統難以想像的大型比較研究計劃。

無論大小，上述幾個案例旨在說明，我們千萬不能小看當代進行比較研究的可行性。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有用比較的方法來解答問題的意識，這樣便能借用各種或強或弱的關係建立比較研究網絡，為比較研究奠下成功的基礎。事實上，由於互聯網的蓬勃發展和社交媒體的普及，無論在世界各地進行網上調查或是收集網民各種電子足跡，都比從前方便不少，對未來的比較研究應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華人社會比較研究的實踐

比較的方法可以應用在世界不同的國家地區。不過，就中港台三地華人社會而言，它們不僅跟西方社會有不少分別，其內部差異也很大。從傳播制度而言，中國大陸實行的是政治集權，傳媒是黨國的喉舌；台灣是一個擁有新聞自由的民主體制；香港則是一個非民主但相當長時間內曾有過新聞自由的地方。中港台三地好像是世界多種社會類型或新聞體制的縮影，而當中的相同點及矛盾正好為我們提供了三個不可多得而資料豐盛的社會實驗室和比較場地。無論是為了理論概念的創新，或是為了檢驗和修訂西方的理論概念，華人社會的比較研究都應該大有可為。當然，我在這裡所倡議的比較研究取向，並非囿於於中港台三地的比較，也應包含華人社會與世界各國的比較，甚至世界各國或文化系統之間的比較。事實上，中華傳播研究者的理論視野不應該只限於華人社會，而是面向世界的。我們進行比較研究不是為比較而比較，而是為了特定研究目的而進行。具體比較國家地區的選擇則是根據提問及研究設計的邏輯來決定。

以前比較傳播研究在國際上是講多做少。這20年來，比較傳播研究增長顯著，可謂成了一種趨勢。期間內，以華人社會作為比較研究對象的研究也有所增加。我想在此舉幾個實例進一步說明華人社會比較傳播研究的可行性及可取性。我選擇這些例子，主要不是因為它們是什麼完美創新之作，而是它們皆為認真的比較研究，又是我所熟識的，談起來較得心應手一些。這些研究應有其有不足的地方，但批評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檢討並非我這篇論文的目的。我只希望我的介紹能引起大家對比較思維及比較傳播研究的關注和興趣。如有人從中受到一點啟發，那將是喜出望外的收穫。

我首先想介紹的比較研究是關於香港回歸的國際報導。香港於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那是世界矚目的大事，我們預期將有數以千計的新聞工作者雲集香港採訪報導。那時我和李金銓、潘忠黨和蘇鑰機都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同事，大家感到回歸是一個透過比較研究探討世界各地新聞範式的黃金機會。我們遂選定中國、香港、台灣、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澳洲的重要傳媒，收集它們回歸前後的相關報導，以作內容分析和文本分析之用。此外，在回歸日那一個星期內，我們分頭訪問相關外來及本地七十多位記者，從而增加對他們報導手法的了解。

分析架構上，我們(Lee, Chan, Pan, & So, 2002)把國際新聞看成是一個複雜的比較論述系統，個中的論述框架受到事件的性質、新聞架設(news staging)、新聞議題、馴化/全球化、炒作/本質化(hyping/essentialization)等因素及過程的影響。比較研究的結果多種多樣，不能在這裡逐一談及。簡單歸結一句，那就是：一個事件、多個故事。回歸日下著滂沱大雨，中國傳媒說下雨是一洗百年國恥，而英國傳媒則借此暗喻光榮撤退的離愁。美國關注的是回歸後香港的民主自由的前景，日本傳媒關注的是回歸後香港及中國的經濟轉變。總之，各地傳媒對香港回歸一事的關注的重點、報導框架，以至訪問對象都顯示出頗大的差異。這種差異不但存在於東西之間，也存在於東西內部。中港台三地的報導差別也很大，中國的報導是慶祝回歸的凱旋式報導，香港傳媒所反映的更多是前景的不確定性，而台灣則是對一國兩制的疑惑。透過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各地的新聞範式尚未如一些學者所預期的趨同歸一，國家邊界對國際新聞報導的影響還是很大。在國際新聞的製作過程中，外派記者主要還是從既有的新聞範式出發，把香港回歸的事件「馴化」為編輯及受眾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新聞故事。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香港回歸成了世界媒介奇觀，傳媒都盡其所能地標榜事件的重要性和戲劇性，但是傳媒的報導角度則是以國族利益、意識形態、文化傾向為依歸。由此可見，世界各地

的新聞範式並沒有隨著全球化而變得一致，很大程度還是眾聲喧嘩。

新聞工作者一直是新聞研究的一個中心對象。中港台三地同文同種，但由於政治及傳播制度不一，新聞人員的新聞觀和表現的異同自是備受關注。祝建華、Weaver、羅文輝、陳崇山、吳薇 (Zhu, Weaver, Lo, Chen, & Wu, 1997) 是第一批從比較的角度來探究三地新聞人員的學者。他們比較的對象除了中國大陸和台灣外，尚包括美國，是三地新聞工作者問卷調查資料的二次分析 (secondary analysis)。由於三地的政治制度及文化特徵有異有同，他們得以依照個中的異同組合來進行比較。他們基本上是從新聞專業主義的研究傳統出發，探討哪一層次——社會、組織、個人——的因素對新聞工作者的傳媒角色的看法影響最大，同時也想比較三地社會特性中究竟是「政治系統」或是「文化傳統」的因素對新聞人員的新聞觀念更具決定性影響。透過比較，他們發現影響新聞人員對傳媒角色看法最重要的是社會政治層次的因素，其次是組織因素，最微不足道是個人因素。至於第二個提問，他們發現「政治決定論」比「文化決定論」更能解釋三地新聞人員對傳媒角色看法的差異。

關於中港台三地更有系統及大型的專門研究則完成於90年代末期。當時我和香港中文大學多位同事——潘忠黨、李金銓、蘇鑰機、陳懷林、魏然——和台灣政大教授羅文輝，合力對三地新聞工作者的新聞範式進行比較研究。我們具體的研究涵蓋範圍包括新聞人員對媒介角色、新聞價值、專業倫理、工作滿意度和新聞典範等概念的看法。每一專題都有研究的框架，這裡不能逐一細說。總的來說，研究的主要焦點在於探討新聞人員的新聞觀的結構及成因。我們在三地以問卷抽樣調查的方式收集有關資料。透過比較，我們發現，中港台的主流新聞範式雖然在各方面的表現並非完全一致，但大體上有相互呼應的地方，可謂自成一體 (羅文輝、陳韜文、潘忠黨、蘇鑰機、陳懷林、李金銓、魏然，2004)。總的來說，大陸和香港的新聞範式相差最大，台灣則介乎兩者之間。在新聞知識論方面，三地的新聞人員都認同新聞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卻對新聞能否反映現實，以及事實和觀點能否區分等問題則看法不同；其中又以大陸新聞人員較不相信新聞能反映現實，也比較不相信事實與觀點可以區分。至於新聞價值，儘管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三地新聞人員對新聞準確性和客觀性等新聞價值的看法相近，但對新聞的全面性、新意和獨家性等評價則差異頗大。這些發現顯示出，新聞範式或有超越社會和組織的一些共同原則，但是有關原則的運用則受到社會和具體情境的影響。在倫理態度上，三地新聞人員對接受新聞來源的不同饋贈觀點不一。最敏感的是金錢饋贈，三地新聞人員對此均認為不可接受。但是，當被問及金錢饋贈是否為普遍現象時，大陸新聞人員認為這種現象普遍的比例遠高於香港同行，台灣新聞工作者則介於兩者之間。這顯示出，三地新聞人員對新聞倫理的標準在態度上相當一致，但在實踐時則因具體環境不同而出現頗大的差異。當我們把這些差異脈絡化，即是讓新聞人員提供解釋的時候，他們大多是歸因於三地的貪污和法治狀態不一所致。

除了新聞生產者研究外，另一個焦點是新聞消費(news consumption)。過去十年，用手機看新聞已成了世界潮流，華人社會的年輕一代更是如此。魏然及羅文輝(Wei & Lo, 2021)有見於此，乃就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四個城市的大學生手機新聞消費展開比較研究。他們收集資料的方法是以問卷調查為主，輔以焦點訪談，在2010與2017-2018年先後分兩次進行。研究的提問包括：究竟人們如何及為什麼收看手機新聞？手機新聞消費有什麼效果？社會環境如何影響手機新聞的消費及效果？最後的問題跟科技決定論的爭議有關，從中可以探究社會環境或是通訊技術的影響更具決定性作用。

分析架構方面，他們結合了手機新聞消費的動機、過程和效果，使用及滿足理論、新聞互動等理論，界定出影響新聞消費的因素及過程。手機新聞消費方面分為五個面向，包括動機、消費、投入消費(engaged consumption)、感知(perceptions)和獲取知識(knowledge acquired)。經過對比，他們發現四地的大學生在消費模式上有相近的地方。例如，手機新聞的消費隨著手機的普及而有所增加，而較能激勵人們消費手機新聞的是守望環境的動機及對手機新聞的好處預期。手機新聞消費能夠引發新聞參與(engagement with news)，突顯出手機的互動性、社會性和參與性。消費越多，參與越多。不過，手機新聞消費所產生的效應卻隨社會環境變化而有所不同。譬如，上海大學生是最熱衷新聞消費的一群，但是他們對國際政治知識如美國與朝鮮關

係的認識卻最少。上海和新加坡的大學生傾向相信手機新聞較為可靠，但是對手機新聞缺乏政治多元性卻多所批評。他們認為這種差異是因為四地在新聞自由及訊息可及性的差別所造成。透過系統的對比，他們發現就算是同樣的手機新聞、類似的消費模式，所造成的效果卻因社會系統因素不一而有所不同。總的來說，手機新聞的消費很大程度是資訊科技被社會形塑的結果。

上述比較研究都不是為比較而比較，而是在設計時已自覺要解決一些新的提問，有其特定的目的。它們一方面比較同一現象是否出現在不同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從異同中看到脈絡因素如何影響特定現象的表現，從而分析系統層次因素對傳播的影響。

以上研究都是與新聞研究有關的。比較研究當然可以應用在大眾文化、健康傳播、公共關係、廣告、政治傳播等方面。以健康傳播或全球傳播為例，現在肆虐全球的新冠狀病毒，正是不少學者有興趣研究的題目，而比較研究的取向對此議題特別適用，可以大派用場。單是以帶口罩的行為為例，華人社會一般很容易接受這是防疫的必要動作，但歐美社會則頗為抗拒。一個看似科學的防疫措施卻引起截然不同的反應，箇中原因為何？如何受到傳媒，以至政治、文化、歷史等因素的影響？這是發人深省的問題，而比較研究則是找尋答案最恰當的方法。疫情大流行期間，在隔離狀態中人們如何重組生活？怎樣保持社會連接？傳媒的作用是否會因社會組織形態而變化？又譬如疫症流行期間，謠言、假新聞充斥社交媒體，它們是關於什麼的？從何而來？如何傳播？對受眾有何影響？這些又如何受到社會系統的影響？這些問題都是很有意義的問題，如果在華人社會中進行比較研究，又或者也把歐美國家拉進來一起比較，研究的寬度、深度和新意都會有所拓展。由於疫情是世界性的，各地都受到衝擊，不少學者都有相近的研究需求，這無疑為比較研究造就了比平常更有利的環境。

結語：中華傳播學的想像

回顧中華傳播學過去幾十年的發展，無論是教研機構、師生數目、研究產量，均可謂發展蓬勃。但新理論概念，尤其是具有跨文化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影響力的理論概念，可謂貧乏。要提高華人社會傳播研究對世界傳播學的貢獻，並促進東西之間更平等的對話，必須提高研究者的創新意識和比較意識。

創新首先源於研究者的求新意願，因為求新意願能夠啟動想像力和聯想力，使我們把相關的現象和概念連接起來，從而提出新的理論或洞見。相反，缺乏求新意願，滿足於重覆性研究，結果只會加深理論概念的貧乏狀況。在全球化、現代化、數碼化等趨勢衝擊下，華人社會經歷高速的變遷，理論概念必須有所更新才不會落後於社會現實。華人社會脈絡本身有其獨特性及前沿性，所蘊藏的理論概念創新力可以媲美歐美各國，我們不可妄自菲薄。這種自信，不是出於民族主義的要求，而是因為我們相信歷史並非線性發展，華人社會自有其先導、獨特的地方。

為了創新，我建議大家採取一個比較研究的取向，多運用比較思考及多做比較研究。這裡所說的比較取向，不一定是指正規的比較研究，更多是指可以應用在單一社會系統或個別事物研究的比較思維。這種比較思維可以應用在概念化、提問、假設、理論、研究重要性發掘等各個環節。比較研究則在知識論上有其優勝之處。無論是為了理論概念的創新、為了檢測理論概念的適用性，以及為了找出社會脈絡或社會系統因素對傳播的影響，比較研究都是非常恰當的選擇。

國際上比較傳播研究的發表越來越頻繁，已成為一種趨勢。比較傳播研究不單是可欲的，也是可行的。中港台三地同文同種，但政治制度及傳媒結構差異頗大，無疑是比較研究的天然場地。由三地出發，再與世界各國進行比較，也是比較研究應該走的方向。誰跟誰比較？最終是取決於研究問題所需要的研究設計和資料的可及性。不過，我們對中港台三地最為了解，資料的可及性也高，而三地的傳播問題又是我們關注的焦點，如從三地著手比較研究或進行比較思考，當屬自然之舉。

傳播學源自西方，西方學者是傳播研究的先行者，這是毋庸置疑的。不過，從比較的角度看來，美國的傳播學只是一方之學，源自中港台等地華人社會的傳播理論概念也是一方之學。東西兩地即使學有先後，但社會脈絡沒有先天高低之分，關鍵在於研究是否有所創新，

是否能夠增加我們對社會的知識。我相信從比較角度完成的研究更能與世界學術界平等對話。我們應以平等及獨立思考的態度對待自己及西方的研究，不搞拿來主義，也不固步自封。國際學術界最關注的是理論概念的創新，只有理論研究創新，本土傳播研究才可以跟世界學術進行更有意義的對話。我們如果有足夠的求新熱情，加上比較視角的自覺運用和其他研究主客觀條件的配合，我們對中華傳播研究的美好想像自是可期。相反，假如我們連學術自由這種創新的基本條件都不存在，卻又滿足於重覆性或行政研究，結果當然會是另外一番景象。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李金銓 (2012年4月19日)。〈海外中國傳播研究的知識地圖〉。取自 <http://www.icenci.com/Interview/2012/0419/534.html>。
- Lee, C. C. (2012, April 19). Haiwai Zhongguo chuanbo yanjiu de zhishi ditu. Retrieved from <http://www.icenci.com/Interview/2012/0419/534.html>.
- 陳韜文 (2002)。〈理論化是華人社會傳播研究的出路：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張力處理〉。張國良、黃芝曉 (編)，《中國傳播學：反思與前瞻》(頁125–145)。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Chan, J. (2002). Lilunhua shi huaren shehui chuanbo yanjiu de chulu: Quanqiuhua yu bentuhua de zhangli chuli. In Zhang Guoliang, & Huang Zhixiao (Eds.), *Zhongguo chuanboxue: Fansi yu qianzhan* (pp. 125–145).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 陸曄、潘忠黨 (2002)。〈成名的想像：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新聞學研究》，第71期，頁17–59。
- Lu Y., & Pan Z. (2002). Chengming de xiangxiang: Zhongguo shehui zhuanxing guocheng zhong xinwen congye zhe de zhuanke zhuyi huayu jiangou. *Xinwen xue yanjiu*, 71, 17–59.
- 羅文輝 (2012)。〈創新傳播研究的追尋：長江學者陳韜文的學術理念〉。《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0期，頁1–10。
- Lo, V. H. (2012). Chuangxin chuanbo yanjiu de zhuxun: Zhangjiang xuezhe Chen Taowen de xueshu linian.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20, 1–10.
- 羅文輝、陳韜文、潘忠黨、蘇鑰機、陳懷林、李金銓、魏然 (2004)。《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台北：巨流出版社。

《傳播與社會學刊》· (總) 第 56 期 (2021)

Lo, V. H., Chan, J., Pan Z., So, Y. K. C., Chen, H., Lee, C. C., & Wei, R. (2004). *Bianqian zhong de dalu, Xianggang, Taiwan xinwen ren yuan*. Taipei: Juliu chubanshe.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Bennett, W. L., & Pfetsch, B. (2018). Rethink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 time of disrupted public spher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8(2), 243–253.
- Bennett, W. L., & Segerberg, A. (2013).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umler, J., McLeod, J., & Rosengren, K. (1992). 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J. Blumler, J. McLeod, & K. Rosengren (Eds.), *Comparatively speaking: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across space and time* (pp. 3–18). Newbury Park, CA: Sage.
- Castells, M. (2012).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Cambridge, UK: Polity.
- Chan, M., & Guo, J. (2013). The role of political efficac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ebook use and participatory behavio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young American and Chinese adult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6(6), 460–463.
- Chan, J. (2017). Research network and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 studies: Practice and reflections. In J. M. Chan & F. L. Lee (Eds.), *Advancing comparativ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pp. 241–256). London: Routledge
- Chan, J., & Lee, C. C. (1991).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Hong Kong press in China's orbit*.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Chan, J., & Lee, L. F. (2017). Introduction. In J. M. Chan & F. L. Lee (Eds.), *Advancing comparativ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pp. 1–11). London: Routledge
- Chan, J., & Mao, Z. (2017). The global-local communication synchronization: China's response to the SARs outbreak and the air pollution crisis. In J. M. Chan & F. L. Lee (Eds.), *Advancing comparativ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pp. 171–203). London: Routledge
- Cohen, A. (Ed.) (2013). *Foreign news on television: Where in the world is the global village*. New York: Peter Lang.
- Curran, J., & Park, M. (2000). Beyond globalization theory. In J. Curran & M.-J. Park (Eds.),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pp. 3–18). London: Routledge.
- Edelstein, A. (1982).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Sage.
- Entman, M. R., & Usher, N. (2018). Framing in a fractured democrac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8(2), 298–308.
- Esser, F., & Hanitzsch, T. (2012). On the why and how of comparative inquiry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F. Esser & T. Hanitzsch (Eds.), *The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3–22).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 Esser, F., & Pfetsch, B. (2004). Compar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orient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In F. Esser & B. Pfetsch (Eds.), *Compar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 cases, and challenges* (pp. 3–2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lin, D. & Mancini, P. (2004).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nitzsch, T., & Berganza, R. (2012). Explaining journalists' trust in public institutions across 20 countries: Media freedom, corruption and ownership matter mos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5), 794–814.
- Hanitzsch, T., Hanusch, F., Ramaprasad, J., & Beer, A. (Eds.) (2019). *Worlds of journalism: Journalistic cultures across the globe*.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raidy, M. (2018). Global media studies: A critical agend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8(2), 337–346.
- Landman, T. (2000). *Issues and method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Lee, C. C., Chan, J., Pan, Z., & So, C. (2002). *Global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 Albany, N.Y.: SUNY Press.
- Lee, C. C. (2015).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ritical reflections and a new point of departure. In C. C. Lee (Ed.),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p. 1–28).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 Lee, F., & Chan, J. (2011). *Media,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 movement in post-handover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 Lee, F., & Chan, J. (2018). *The logics of protest in the digital era: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Hong Ko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e, F., Yuen, S., Tang, G., & Cheng, E. (2019) Hong Kong's summer of uprising: From anti-extradition to anti-authoritarian protests. *China Review*, 19(4), 1–32.
- Mill, J. S. (1967).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Qiu, L. J., & Fuchs, C. (Eds.) (2018). Special issue: Ferments in the fiel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8(2), 219–451.
- Ragin, C. (1987).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Chapter 3–5, pp. 34–84).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obertson, R. (1995) 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In M. Featherstone, S. Lash, & R.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pp. 25–44). London: Sage.
- Smelzer, N. (1976). *Comparative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So, Y. K. C. (2017). Mapping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hat the literature reveals. In J. M. Chan & F. L. Lee (Eds.), *Advancing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1–11). London: Routledg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 Sparks, C. (2018). Changing concepts for a changing worl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8(2), 390–398.
- Thussu, D. (2000).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London: New York: Arnold.
- Walter, N., Cody, J. M., & Ball-Rokeach, J. S. (2018). The ebb and flow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8(2), 424–440.
- Wei, R., & Lo, V. (2021). *News in their pockets: A cross-city comparative study of mobile news consumption in Asia*.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rth, W., & Kolb, S. (2004). Designs and methods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F. Esser & B. Pfetsch (Eds.), *Compar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 cases, and challenges* (pp. 87–1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hu, J., Weaver, D., Lo, V., Chen, C., & Wu, W. (1997). 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and societal influences on media role percep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ournalists in China,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4(1), 84–96.

本文引用格式

陳韜文 (2021)。〈從比較視角看中華傳播的研究與創新〉。《傳播與社會學刊》，第56期，頁225–250。